

對清人趙之謙書法發展的幫助：以沈樹鏞及其鑒藏群體為考察

鄧君浩

摘要

趙之謙為清代重要的碑學書家之一，其書法的發展，實脫離不了金石友人的幫助。本文藉由趙之謙金石友人沈樹鏞及其鑒藏群體，考察對趙之謙書法的幫助與影響。筆者通過趙之謙雙鉤本與北魏書風發展兩方面展開，趙之謙雙鉤本以《二金蜨堂雙鉤漢刻十種》與雙鉤《劉熊碑》探討，通過趙之謙雙鉤漢刻石《二金蜨堂雙鉤漢刻十種》，反映出鑒藏群體發揮的作用，以及考察《二金蜨堂雙鉤漢刻十種》的傳藏。另外從趙之謙雙鉤漢代刻石中，與金石鑒藏家互相賞鑒拓本，延伸出對《群臣上壽刻石》石刻年代的學術探討。筆者從沈樹鏞度藏的《劉熊碑》拓本、雙鉤本題跋探討趙之謙雙鉤中的想像力；趙之謙北魏書風的發展，從沈樹鏞輯《造像拓本》二集與搜求北朝石刻目的展開，考察鑒藏群體對趙之謙書風的幫助。

關鍵詞：趙之謙、沈樹鏞、鑒藏群體、《二金蜨堂雙鉤漢刻十種》、《劉熊碑》

Contributions to the Calligraphy Development of Zhao Zhiqian in the Qing Dynasty: A Case Study of Shen Shuyong and His Collection Fellows

TENG Jun-hao

Abstract

Zhao Zhiqian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stele calligrapher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development of his calligraphy was inseparable from the help of friend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help and influence of Zhao Zhiqian's calligraphy through Zhao Zhiqian's friend Shen Shuyong and his connoisseurs. The author explores through Zhao Zhiqian's double-hook ver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lligraphy style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Zhao Zhiqian's double-hook version discusses with "Ten Kinds of Double Hook Han Carvings in Erjindietang" and double-hook "Liu Xiong Stele", reflecting the role played by the connoisseurs and collectors, as well as examining the collection of "Ten Kinds of Chinese Carvings with Double Hooks in Erjindietang". In addition, from Zhao Zhiqian's double-hook stone carvings in the Han Dynasty, he and gold and stone connoisseurs appreciate each other's rubbings, and extend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on the age of the stone carvings of "Zhao Twenty-two Years". The author discusses Zhao Zhiqian's imagination in the double hooks from the rubbings of "Liu Xiongbei" and the inscriptions and postscripts of the "Liu Xiong Stele" collected by Shen Shuyong; The group's help to Zhao Zhiqian's writing style.

Key words: Zhao Zhiqian, Shen Shuyong, connoisseurs and collectors, "Ten Kinds of Chinese Carvings with Double Hooks in Erjin Butterfly Hall", "Liu Xiong Stele"

一、趙之謙雙鈎漢刻石、漢碑探討

在未有印刷之前，對於石刻的複製，不外乎是翻刻、拓本與雙鈎。在金石學鼎盛的清代中後期，金石學家不僅借由雙鈎得到古代碑刻的副本，從雙鈎本看出每個人觀察斑剝的石刻，反映出不同的理解。從前人研究中，雙鈎萌芽於宋，盛行於清代，在翁方綱（1733-1818）、黃易（1744-1802）等金石學家推廣，黃易又輯多本雙鈎本成冊，對後世流傳有重要的意義。從清人雙鈎中，總結為便於攜帶、複製保存、傳播、對勘、考據等作用。¹事實上，早已有學者研究清代書法家錢泳（1759-1844）時，已經提及其臨寫、雙鈎、描圖、繪形等方法，並展開探討。²近期研究中又於此研究基礎上，梳理乾嘉以後的金石學家、書家的雙鈎活動與其脈絡，探討雙鈎本成為臨習範本之後帶來的一些問題³。沈樹鏞以及鑒藏群體將所藏拓本提供給碑學書家趙之謙，探討趙之謙雙鈎及考釋過程，以及試探趙之謙雙鈎背後的意義與鑒藏家群體對碑學書家趙之謙的影響。

（一）《二金蜨堂雙鈎漢刻十種》反映出金石鑒藏群體貢獻

1. 《二金蜨堂雙鈎漢刻十種》概況及流傳

碑學書家趙之謙（1829-1884）有《二金蜨堂雙鈎漢刻十種》問世，但此雙鈎本甚少出現在世人眼前。借由趙之謙篆刻印章「二金蜨堂雙鈎兩漢刻石之記」，後世之人得以瞭解趙之謙雙鈎漢代刻石的活動。趙之謙欲雙鈎漢代刻石的活動，信中告知沈樹鏞（1832-1873）：「弟有雙鈎漢石之議，明後日再面商」，⁴雖是趙之謙雙鈎漢代刻石的活動，卻特意告知沈樹鏞，而且還要面商，可見沈樹鏞在趙之謙雙鈎活動中佔據重要的角色。

另一方面，趙之謙要雙鈎漢刻石，勢必要有拓本作為底稿，而鑒藏家所藏拓本在此時就顯得格外的重要。趙之謙欲雙鈎漢石的動機，從序中可知，當時太平天國戰亂的背景之下，除了家人死去，有了切身之痛，再加上自家流傳已久的藏品文物毀於戰火，如「七世祖旌孝子伯密君所藏李伯時畫十葉，守已百九十一年，亦毀於賊」，所以有「若其著錄，此區區者更足道，況欲為之舉世不尚與毀棄之後哉」之語。⁵

趙之謙雙鈎漢刻石十種⁶，此十種石刻可見於雙鈎本木匣上的題簽（圖 1）。題簽曰：「同治二年太歲在癸亥九月十八日裝成，書覆陟釐紙，宋時物，韻初分惠，搗叔並記。」⁷內頁可見胡澍所題：「二金蜨堂雙鈎漢刻十種，搗叔老弟同年，續谿胡澍。」⁸而魏錫曾在《書二金蜨堂雙鈎漢刻十種序跋後》云：

¹ 程渤，〈清代雙鈎摹寫法研究〉，《美術學報》，第 5 期（2014）：頁 98-104。

² 盧慧紋，〈錢泳《攀雲閣帖》初探〉，載於孫曉雲、薛龍春主編，《請循其本：古代書法創作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 315-320。；盧慧紋，〈碑與帖的交會—錢泳《攀雲閣帖》在清代書史中的意義〉，《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31 期，（2011）：頁 208。

³ 薛龍春，〈當雙鈎本成為範本—乾嘉以後古碑的雙鈎、刊印與取法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51 期，（2021）：頁 185-245。

⁴ 趙之謙著、戴家妙整理，《趙之謙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頁 295。

⁵ 同上註，頁 107。

⁶ 如《趙廿二年上壽刻石》《甘泉山元鳳殘字》《楊量買山記》《萊子侯石刻》《南武陽攻曹墓闕》《沙南侯殘碑》《文叔陽食堂記》《李禹表》《陳德殘碑》《楊叔恭殘碑》，《書苑》，第 7 卷第 1 號，三省堂（1943）：頁二金蜨（首一）。

⁷ 《書苑》，第 7 卷第 1 號，三省堂（1943）：頁二金蜨（首一）。

⁸ 同上註，頁二金蜨（一、二）。

同治癸亥秋冬間，見搗叔成此書於都門，其正本旋貽韻初（鈎摹跋語用高麗箋，以側理紙為前後副葉，宋藏經紙書簽），而以雙鈎初稟畀余。丙寅九月，余訪韻初吳門，手錄此本，至辛未四月十八日始綴成冊，續當據初稟重鈎入此序跋，俾為副本行世，幸苦嫻情，不知何日踐此言也，十九日記。⁹

顯然趙之謙雙鈎漢刻石十種，有正本與初稿。另一方面，從文字中看出魏錫曾欲重鈎的計劃。魏錫曾在同治五年丙寅九月訪沈樹鏞，對照魏錫曾日記，在同治六年丁卯，魏錫曾在日記中記載《二金蜨堂雙鈎漢刻十種》內有關的漢刻石，如在正月二十二日當日錄《萊子侯石刻》、錄《文叔陽題字》、燈下細閱《南陽攻曹墓闕》一過、錄《李君表》¹⁰，顯然在這一天魏錫曾抄錄《二金蜨堂雙鈎漢刻十種》內的幾種漢刻石。魏錫曾所言重鈎的計劃與日記中的文字可以相互印證。

在三省堂發行的《書苑》第七卷中接連幾期陸續刊登《二金蜨堂雙鈎漢刻十種》圖版，並注記當時的收藏者為「全氏葆華閣藏」。此雙鈎本上除了鈐有「同時審定印」「二金蜨堂雙鈎兩漢刻石之記」「兩方印記，另鈐有近代收藏家林熊光鑒藏印「朗庵秘玩」。兩本雙鈎本的流傳，秦更年曾有記錄：「右趙搗叔手鈎漢刻十種，世有兩本，一用高麗箋鈎，宋陟釐紙書覆，藏經箋簽，後歸沈韻初，今在羅雪堂家。一紙墨稍遜，後歸魏稼孫，今不知在何處。去年秋雪堂南來，述及此本，因從借觀。」¹¹可知沈樹鏞所藏《二金蜨堂雙鈎漢刻十種》的正本，後藏於羅振玉之處。羅振玉將《二金蜨堂雙鈎漢刻十種》記於《宸翰樓所藏書畫目錄》中¹²，此目錄中又見羅振玉藏有《趙搗叔手簡冊》《潘文勤尺牘一本》《沈韻初尺牘冊》《吳憲齋尺牘冊》等¹³，可見羅振玉的收藏不僅僅是金石拓本，甚至藏有咸、同年間金石家相互來往商討金石的書信。

2. 《二金蜨堂雙鈎漢刻十種》反映出的金石鑒藏群體

趙之謙雙鈎《二金蜨堂雙鈎漢刻十種》需要大量的拓片資料相互校觀。從跋中，可見多位趙之謙金石友人所收藏的拓片，如沈樹鏞、潘祖蔭、劉銓福、樊彬等，且多為趙之謙抵京師後結交的友人。在趙之謙致江湜信中，提及新交樊彬、劉銓福、溫忠善等金石友人。¹⁴這些金石友人反映出一個鑒藏群體，非一人的收藏。例如《趙廿二年上壽刻石》，趙之謙在沈樹鏞所藏拓片上題跋：「此西漢祖刻，指為石趙者非。」¹⁵趙之謙在《趙廿二年上壽刻石》雙鈎本中抄錄劉位坦跋文三則，而劉位坦為劉銓福先人，趙之謙能見到劉位坦題跋拓本，應與劉銓福有深摯的友誼。而《甘泉山元鳳殘字》《陳德殘碑》《楊叔恭殘碑》三種也是劉銓福所藏相助¹⁶。《二金蜨堂雙鈎漢刻十種》內趙之謙跋語之中，多次提及樊彬，如《南武陽攻曹墓闕》：「溫元長、沈韻初皆藏一本，樊文卿丈曾竭力辨出百餘字。余復依拓本求之，

⁹ 魏錫曾撰，《魏錫曾全集》《續語堂題跋》，《叢書集成續編》原刻景印光緒癸未刊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無頁碼。

¹⁰ 《魏稼孫日記殘稿》，上海圖書館館藏稿本。

¹¹ 秦更年撰、秦藜整理、吳格審定，《嬰閣題跋》（中華書局，2019），頁 225。

¹² 《宸翰樓所藏書畫目錄》戊：資聞錄中記載條目：「趙搗叔二金蜨堂雙鈎漢碑一種手寫本一冊，又跋尾稿一冊。」錄自羅振玉撰述、蕭文立編校，《雪堂類稿·戊·長物簿錄》（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頁 582。

¹³ 羅振玉撰述、蕭文立編校，《雪堂類稿·戊·長物簿錄》（2003），頁 588。

¹⁴ 趙之謙著、戴家妙整理，《趙之謙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頁 257。

¹⁵ 〈清拓西漢群臣上壽刻石〉，北京故宮博物院院資料，<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impres/228607.html>（2021 年 12 月 7 日檢索）。

¹⁶ 楊斌，〈趙之謙與劉銓福金石交遊考〉，《書法》（2020），頁 61。

爲攷釋數字，然終不敢信。」¹⁷ 俞樾《春在堂隨筆》中指出樊彬釋此石刻文字錯誤甚多，與趙之謙所言相印證。趙之謙在雙鈎《沙南侯殘碑》的跋語中，言及此本是從樊丈雙鈎摹出¹⁸。從潘祖蔭對此碑刻的搜求過程極爲困難，可知《沙南侯殘碑》拓本甚少。趙之謙在《文叔陽食堂記》跋中，提到借潘祖蔭所藏拓本及樊彬摹本¹⁹。趙之謙在雙鈎《楊叔恭殘碑》，借劉銓福、溫忠善所藏拓本錄出²⁰。《李禹表》跋中可見趙之謙「重檢各家拓本校之」²¹此語。趙之謙在《萊子侯石刻》跋語中未透露參考拓本，沈樹鏞於咸豐年間得此石刻拓本，讓趙之謙錄入《補寰宇訪碑錄》中，此拓本應對趙之謙雙鈎漢刻石有其助益。趙之謙在《楊量買山記》跋語中也未透露參考何人所藏，浙江省博物館藏有沈樹鏞舊藏《楊量買山記》拓本，從褚德彝題跋中可知此本爲六舟舊藏²²。但在日本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另藏有一紙《楊量買山記》，上有沈樹鏞鑒藏印與趙之謙題記，題記云：「楊量買山記，第四行三字是分字。余校劉子重初拓本。及此紙背，息心靜驗得之。悲盦記。」²³可知趙之謙考釋《楊量買山記》來源拓本。綜合以上趙之謙跋語中的訊息，可以總結出趙之謙考釋漢刻石的文字，不止參考一家拓本、摹本，而是衆多金石友人提供不同拓本對勘。

趙之謙雙鈎漢刻活動過程中，時常在信中告知沈樹鏞進度，如：「《文叔陽》一種，今日能鈎畢。」²⁴ 信中又知劉銓福家中遭竊，未見《沙南侯碑》，才轉向樊彬所藏²⁵。趙之謙致沈樹鏞信中曾乞取陟釐紙、籤紙，²⁶ 更突顯出沈樹鏞在此雙鈎活動中佔有重要的角色。沈樹鏞與趙之謙金石友人形成的鑒藏群體，提供所藏拓片，對趙之謙雙鈎與考釋石刻上斑剝的文字，起了重要的作用。

3. 俞樾、趙之謙與沈樹鏞三人賞鑒《群臣上壽石刻》

俞樾與沈樹鏞賞鑒漢代石刻《群臣上壽石刻》，學術上的探討，記載於《春在堂隨筆》中：「沈韻初孝廉樹鏞以《群臣上壽石刻》見示。」²⁷ 沈樹鏞致俞樾信中，請教藏品《群臣上壽石刻》石刻年代的問題。沈樹鏞在《群臣上壽石刻》的年代問題上，質疑當時的人所提出的年代說法，並將所藏《群臣上壽石刻》拓本與抄錄劉位坦的說法向俞樾請教。沈樹鏞對於《群臣上壽石刻》刻石年代的觀點，以書體爲論點，以「惟字體古樸實爲漢篆，與晉人書回別」，否定了沈濤所言石勒時物的說法。²⁸ 俞樾回沈樹

¹⁷ 趙之謙著、戴家妙整理，《趙之謙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頁112。

¹⁸ 同上註，頁113。

¹⁹ 同上註，頁114。

²⁰ 同上註，頁115。

²¹ 同上註，頁115。

²² 浙江省博物館編、桑樞主編，《六舟——一位金石僧的藝術世界》（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頁87。

²³ 日本：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編，《趙之謙之書畫和北魏之書——悲盦沒後130年》（台東區藝術文化財團，2014），頁16。

²⁴ 趙之謙著、戴家妙整理，《趙之謙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頁297。

²⁵ 同上註，頁113。

²⁶ 同上註，頁295。

²⁷ 俞樾撰、徐明、文青校點，《春在堂隨筆》（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頁17。

²⁸ 沈樹鏞信云：「承諭劉寬夫侍御所考《婁山石刻》未爲的當，鏞固積疑已久而未請質者。侍御之泥定趙王遂，以援《五鳳石刻》之例故也。摩厓鑿石，非若碑記有一定體例，必執五鳳一石，遽定此刻在文帝無年號時，實難憑信。至謂後漢變篆爲隸，此石篆刻必在西漢，則所見後漢碑石篆刻者甚多，將何說與？惟字體古樸實爲漢篆，與晉人書回別，斷非石趙時物。今以石刻拓本並劉說錄呈，賜題石拓本上。鏞擬續輯翁氏《兩漢石刻記》，俾得有所適從也。若依劉說，則此刻冠兩漢矣。尙甚疑之。」上海圖書館編，《俞曲園手札·曲園所留信札》下（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1），頁295。

鏞的兩封信中，對劉位坦所提出年代的說法也產生質疑。趙之謙在雙鈎漢代刻石《趙廿二年上壽刻石》跋中云：「余來京師，首見此刻，即斷爲西漢人作，彼時但據書法字體得之。」²⁹ 可見趙之謙以書體論斷爲西漢人之作，又云：「寬夫先生所考最精核」³⁰，顯然趙之謙是認同劉位坦說法。在已有研究中，作者馬順平雖未看過沈樹鏞致俞樾此信，但比對沈濤、張德容、劉位坦、俞樾、趙之謙與陸增祥等各家說法，最後以陸增祥從書體和干支兩方面，斷定《群臣上壽刻石》的年代應爲「西漢時物」，從此研究也可知陸增祥的研究也早於後世徐森玉的研究。³¹

（二）從《天一閣宋拓劉熊碑雙鈎本》探討趙之謙雙鈎問題

1. 沈樹鏞藏《劉熊碑》拓本、雙鈎本概況

趙之謙除了將《二金蜚堂雙鈎漢刻十種》正本贈與沈樹鏞，沈樹鏞也倩請趙之謙雙鈎《劉熊碑》。沈樹鏞所藏《劉熊碑》拓本數量，可以從趙之謙題跋與來往書信中得知。從趙之謙篆刻「均（韻）初藏寶」邊款文字，可知沈樹鏞得元拓《劉熊碑》³²，在沈樹鏞收藏的《劉熊碑》拓本，趙之謙題簽：「漢酸棗令劉熊碑，海內有數拓本，同治二年十二月，韻初得於都下，裝池成。」³³ 可見沈樹鏞於歲末得此拓本。

當時已知有數本在流傳。據已有的研究中，顯示出不同版本³⁴，其中數本後流傳到收藏家端方所收藏，端方與友人也對此數本作一賞鑒³⁵。趙之謙在沈樹鏞所藏《劉熊碑》題跋，其中可知趙之謙除了參考洪氏《隸釋》考釋，又校翁氏摹刻江秋史、巴予籍雙鈎本。³⁶ 可見沈樹鏞不僅藏有一本《劉熊碑》，也藏有《蘇米齋雙鈎漢劉熊碑》，此本爲葉氏平安館刻翁方綱雙鈎本。趙之謙在同治三年爲沈樹鏞所藏此本題簽「蘇米齋雙鈎漢劉熊碑」³⁷；沈樹鏞也在《蘇米齋雙鈎漢劉熊碑》上題記云：「右題語，齊梅麓太守手跡也，齊氏鈎本亦藏予家，癸亥冬杪既見石刻真本，知此本鈎摹之善，而齊本多自運處，僅存形模，不足據矣。」³⁸ 薛龍春研究中指出，此題記上所言齊梅麓此人與其齊氏雙鈎本實爲沈樹鏞之誤記。³⁹ 過數年之後，沈樹鏞在另一則題記中云：「題語及舊藏天一閣勾本皆錢梅谿手跡，一時誤記致搗叔所題石本及勾本中接誤。『錢』爲『齊』下筆之不可不慎如此。己巳正月三日，韻初記。」⁴⁰ 由此可見沈樹鏞搜求《劉熊碑》拓本與雙鈎本，並將《劉熊碑》拓本、翁方綱雙鈎本與錢梅谿雙鈎本並列，與趙之謙一起賞鑒。沈樹鏞倩請趙之謙雙鈎《劉熊碑》，在趙

²⁹ 趙之謙著、戴家妙整理，《趙之謙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頁109。

³⁰ 同上註。

³¹ 馬順平，〈晚清金石學者與「群臣上壽刻石」年代考訂——兼論沈樹鏞舊藏拓本的意義〉，《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第6期（2017）：頁117。

³² 齊淵編，《趙之謙編年印譜》（江西美術出版社，2008），頁128。

³³ 《漢酸棗令劉熊碑不分卷》（上海中華書局影印本，1936），中國美術學院圖書館藏。

³⁴ 秦多可，《漢劉熊碑拓跋文解讀和版本淺析》（中國藝術研究院碩士論文，2015）。

³⁵ 周敏珏，《端方及其交遊圈的金石鑒藏研究》（浙江大學博士論文，2019），頁75-89。

³⁶ 《漢酸棗令劉熊碑不分卷》（上海中華書局影印本，1936），中國美術學院圖書館藏。

³⁷ 童衍方，《金石齊壽——金石家書畫銘刻特集》（上海三聯書店，2016），頁212。

³⁸ 同上註，頁212。

³⁹ 薛龍春，〈當雙鈎本成爲範本——乾嘉以後古碑的雙鈎、刊印與取法爲中心〉，《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51期（2021）：頁236。

⁴⁰ 童衍方，《金石齊壽——金石家書畫銘刻特集》（上海三聯書店，2016），頁212。

之謙樞畢後，於同治三年趙之謙為沈樹鏞題簽：「天一閣宋拓劉熊碑雙勾本。」⁴¹

本文考察出沈樹鏞至少藏有《劉熊碑》元拓本、葉氏平安館刻《蘇米齋雙鉤漢劉熊碑》《錢梅谿雙鉤本》與趙之謙雙鉤《天一閣宋拓劉熊碑雙勾本》四種。

2. 從《劉熊碑》拓本、雙鉤本題跋探討趙之謙雙鉤中的想像力

趙之謙於同治甲子正月八日在《蘇米齋雙鉤漢劉熊碑》題跋，認為翁方綱是賞鑒家，評論翁方綱是「年高名盛，舉世宗仰，無敢彈射」。從跋語中，趙之謙認為翁氏之學膚淺，但對於翁方綱蒐羅訪求碑帖拓本，卻是有貢獻。趙之謙對翁方綱雙鉤本評價是「僅留形模，以得長存，誠古人之幸。」⁴²。張祖翼對此有不同看法，認為平安館刻翁氏所據江秋史雙鉤本神味淵永、頗得漢法⁴³。楊守敬在趙之謙雙鉤《天一閣宋拓劉熊碑雙勾本》題跋中，其云：「趙氏見沈本磨泐之甚，故作剝蝕之筆，實非此碑真相也。今以整本照之，乃知翁近而趙遠矣。」⁴⁴楊守敬對翁方綱表示推崇與肯定，反而認為趙之謙所雙鉤之本遠離《劉熊碑》真實原貌。秦更年云：「搃叔摹本余有之，頗參以本家書法，不若覃溪之能得其真。」⁴⁵可見並非一人認為趙之謙雙鉤本較翁方綱雙鉤本遠離原碑真實面貌。趙之謙在《天一閣宋拓劉熊碑雙勾本》中題記云：「幸觀奇寶，以償夙願，因為韻初鈎摹齊本，拊為一冊，復留案頭展閱十日，題記至再，心乎愛矣，不啻有之矣。」⁴⁶顯然趙之謙對自己的雙鉤本頗為滿意。趙之謙在《天一閣宋拓劉熊碑雙勾本》中題記又云：「雙鉤古刻，非能任意為之，一碑有一碑面目，宜先求形似，然後神骨，與臨池大異。」⁴⁷可看出趙之謙認為雙鉤古刻與臨池不同的觀點，看出趙之謙在雙鉤上嚴謹的態度。薛龍春指出趙之謙對自己的雙鉤頗有自信，⁴⁸在同治二年十二月，趙之謙刻「會稽趙氏雙勾本印記」，其邊款文字中可知⁴⁹。在光緒十四年，吳大澂又借沈樹鏞《劉熊碑》拓本，並以趙之謙雙鉤本校定，屬黃牧甫摹勒端石。⁵⁰

比對金石學家對趙之謙與翁方綱雙鉤本的賞鑒，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叢濤在其論文中，認為是趙之謙在學術上與翁方綱爭話語權，以學術之爭為探討。⁵¹但清代金石鑒藏家雙鉤拓本，乃是日常賞玩、賞鑒。所以筆者認為似乎可從另一角度探討趙之謙故作剝蝕之筆，如陳振濂提及陸維釗先生對碑版損蝕需要想像力一說，陸維釗先生云：「而或者以為碑板損蝕，不易審辨，殊不知在此模糊之中，正寓考驗之法。想像力強者，不但於模糊不生障礙，且因之加以自心之新意，入於創造之一途，正如薄霧籠晴，樓台山

⁴¹ 趙之謙樞鈎，《天一閣宋拓劉熊碑雙鈎本一卷》（上海中華書局影印本，1921），中國美術學院圖書館藏。

⁴² 童衍方，《金石齊壽—金石家書畫銘刻特集》（上海三聯書店，2016），頁212。

⁴³ 同上註。

⁴⁴ 同上註，頁213。

⁴⁵ 秦更年撰、秦秦整理、吳格審定，《嬰閣題跋》（中華書局，2019），頁216。

⁴⁶ 趙之謙樞鈎，《天一閣宋拓劉熊碑雙鈎本一卷》（上海中華書局影印本，1921），中國美術學院圖書館藏。

⁴⁷ 童衍方，《金石齊壽—金石家書畫銘刻特集》（上海三聯書店，2016），頁213。

⁴⁸ 薛龍春，〈當雙鈎本成為範本—乾嘉以後古碑的雙鈎、刊印與取法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51期（2021）：頁202。

⁴⁹ 邊款文字云：「不能響拓能雙鈎，但願文字為我留。千載後人來相求。」齊淵編，《趙之謙編年印譜》（江西美術出版社，2008），頁123。

⁵⁰ 顧廷龍著，〈吳憲齋先生年譜〉，《燕京學報專號之十》哈佛燕京學社（1935），頁167。

⁵¹ 叢濤，〈“別有狂言”與“但開風氣”：趙之謙的學術身份與金石審美趣味〉，《文藝研究》，第3期（2022）：頁149-160。

水，可有種種想像，使文家、詩家、畫家，起無窮之幻覺。此則臨摹之最高境界也。」⁵²可見陸維釗先生對於想像力的說法。從創作視角探討，趙之謙見沈本文字磨泐處，故作剝蝕之筆，可能出自於自己的想像力，反映在雙鉤《劉熊碑》之中。

二、趙之謙北魏書風發展探討

（一）清代碑學發展與北朝石刻拓本收藏概況

清代乾嘉年間考據學、金石學興盛之下，延伸出碑學發展。金石學家、鑒藏家搜訪碑帖，及其背後的文化視野，佔有重要的意義。在清代金石碑帖鑒藏活動中，對於北朝石刻的收藏不可忽視。清代金石學者阮元於嘉慶年間完備重要著作《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文中自言所見北朝石刻不下七、八十種，直指為唐人歐、褚師法來源⁵³。可見北朝石刻拓本在當時早已收藏傳布，阮元過眼甚多，此言又突顯出北朝石刻在書法發展史上所佔據的重要樞紐位置，又有倡導之意，不少金石學家、書法家與鑒藏家深受其影響。後繼者包世臣在《歷下筆譚》言及：「《張公清頌》《賈使君》《魏靈藏》《楊大眼》《始平公》各造像為一種，皆出《孔羨》，具龍威虎震之規。」⁵⁴，這具有兩方面涵義，一是對此一類的北碑石刻做一溯源；二是對其作出評論。包世臣構建出以北碑取法的碑學理論，在《國朝書品》中對鄧石如書法的推崇，其著作《藝舟雙楫》於當世抄錄流傳之下，影響甚廣，碑學理論確立。⁵⁵一直到晚清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中提出「尊魏卑唐」，且仿效古人《書品》，取南、北朝碑刻作出品第⁵⁶，顯然對北朝石刻有極高的推崇。

在已有研究提到：「在碑學理論和碑派書法迅速蔓延普及的清代後期，對金石碑刻的搜訪、鑒藏、和研究、宣傳已成為書法藝術重要的社會基礎和學術支持。」⁵⁷所以咸、同年間社會上的書法現象，也可借由咸、同年間金石鑒藏家在文物市場的鑒藏活動中進行側面的探討與瞭解。本文通過沈樹鏞與其他鑒藏家的鑒藏活動，和碑學書法家趙之謙來往中對其書法發展的幫助。

（二）沈樹鏞搜求北朝石刻碑帖目的

從沈樹鏞的金石鑒藏著錄中，漢、唐碑刻拓本所佔比例最高，但其北朝石刻拓本收藏亦不在少數。沈樹鏞喜愛北朝石刻的程度，可從沈樹鏞幾個齋館可知，如鄭齋、靈壽華館。沈樹鏞搜訪北朝石刻拓片的鑒藏活動，從與友人魏錫曾、趙之謙等人的書信之中，透露出其北朝石刻收藏趨向於主題性，例如鄭道昭碑刻與摩崖石刻、造像記等主題的收藏；又如《張猛龍碑》拓本的收藏，沈樹鏞收藏存字不同的拓本；另外又有逐字搜訪的北朝摩崖石刻《泰山經石峪金剛經》。從這幾個面向中，可見沈樹鏞對北朝石刻拓本收藏，存在著一定的關注與執著，其收藏的背後不僅有其喜好，並反映出當時社會上的石刻碑帖收藏文化。

從沈樹鏞金石題跋與友人的書信中，看出沈樹鏞搜求石刻碑帖的目的，其一為用作書法臨摹。沈樹鏞在《北齊孝義雋修羅碑》題跋中可知包世臣對《北齊孝義雋修羅碑》的評論，以險峻取勝，又波發仍

⁵² 陸維釗，《中國書法》（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頁11。

⁵³ 阮元著、鄧經元點校，《擘經室集》（中華書局，1993），頁595。

⁵⁴ 包世臣著、況正兵、張鳳鳴點校，《藝舟雙楫》（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7），頁158。

⁵⁵ 劉恆著，《中國書法史·清代卷》（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2009），頁195。

⁵⁶ 康有為著、況正兵點校，《廣藝舟雙楫》（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8），頁85。

⁵⁷ 劉恆著，《中國書法史·清代卷》（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2009），頁222。

歸蘊藉，並表示此碑為歐陽修書法的前驅。沈樹鏞在五月時，將《歷下筆譚》此段抄錄於拓本。⁵⁸ 沈樹鏞應是認同包世臣對此碑的觀點。同時，從沈樹鏞的金石題跋中，也可看出包世臣學說在咸、同年間對金石鑒藏家的影響。沈樹鏞在此拓本，其上另一段題跋云：「此本原系整幅，尙未刻此，審為舊拓，故裁標成冊，借資臨摹。」⁵⁹ 從沈樹鏞題跋中表示「借資臨摹」，顯然沈樹鏞認為此碑在書法上可以臨摹效仿，反映出沈樹鏞不單純是收藏石刻碑帖。

沈樹鏞「裁標成冊」之行爲，可見沈樹鏞與魏錫曾信中：「弟日日粘冊裱冊，面糊滿桌。」⁶⁰ 沈樹鏞在題跋中也曾云：「曩見《張遷碑》，亦秋盒故物，與此同一裝式，自記凡遇古碑，裁剪之役必自爲之，懼工人損失云云。嗜古者勞其細事亦如此。」⁶¹ 反映出金石鑒藏家，在賞鑒碑帖之餘，也親自裁標古刻碑帖，顯現出對古刻碑帖的愛惜。

在同治三年沈樹鏞致魏錫曾信中，曾商討搜求《泰山石經峪》拓片，信云：「搗叔爲集楹帖，弟以裱成立軸，不便攜帶，故未裝也。」⁶² 趙之謙致沈樹鏞信中也云：「前集石經峪十字，能檢賜否？不須標也。」⁶³ 在沈樹鏞收藏過程中，也曾經對《泰山石經峪金剛經》拓片的真偽產生疑義，進而請教趙之謙。趙之謙也提出他的看法釋疑，在信中云：「此字《石經峪》無疑，小異者以漫漶故，且摩崖書刻，每不一致，無足異。」⁶⁴ 而趙之謙會想集楹帖，表示也關注《泰山石經峪》石刻。從此上兩例，可見沈樹鏞搜求北朝石刻的目的，不僅是收藏，也爲臨摹書法用途，也看出沈樹鏞搜求石刻碑帖對趙之謙的幫助。

（三）鑒藏群體所藏北朝石刻碑帖對趙之謙書法的幫助

在清代碑學發展中，晚清康有爲說：「北碑萌芽於咸、同之際。」⁶⁵ 顯然咸、同年間是北碑在清代碑學發展中的重要時期，趙之謙即是此時期的碑學書家之一。趙之謙對北朝石刻的觀點與鑒藏家在咸、同年間所藏的北朝石刻拓本對其的影響，值得探討。

趙之謙《章安雜說》中云：「余所見無過《張猛龍碑》，次則《楊大眼》、《魏靈藏》兩造像。」⁶⁶ 從《章安雜說》封面題字，可知時間爲咸豐辛酉年，可見趙之謙很早就關注北朝石刻，而且有自我的見解。趙之謙能過眼衆多北朝石刻，與沈樹鏞大量收藏北朝石刻密切相關。在沈樹鏞致魏錫曾信中云：「惟自問北朝碑刻搜羅不少，非久居北地不能也。」⁶⁷ 可知沈樹鏞在京師期間搜求不少北朝石刻，反映出沈樹鏞在金石搜求的志向。沈樹鏞所藏，如龍門四品中《楊大眼造像記》（圖2）、《北魏鄭文公碑》（圖3）。而影響趙之謙書法最深的應是沈樹鏞在同治二年輯《六朝造像拓本集》，在《清稗類鈔》中《趙搗叔選定魏齊造像二十品》言及：

魏、齊造像二十品，為沈均初請趙搗叔所選定，以字體筆法最精妙者二十種，合為一冊，每種

有搗叔題簽及跋志，又有均初題志，為極有意味之品。⁶⁸

沈樹鏞將所藏北朝拓片，倩請趙之謙精選造像二十品。雖名為《造像集》，但後卻附有《雋修羅碑》⁶⁹，狄平子云：「冊首題爲造像，但冊末附存墓誌與碑各一，意搗叔、韻初愛此碑誌，不忍割愛，今亦仍其故，存於後方。」⁷⁰ 從此處也可以看出沈樹鏞與趙之謙皆愛好《雋修羅碑》，輯入此冊，借此可以印證沈樹鏞在《北齊孝義雋修羅碑》題跋中所言「裁標成冊，借資臨摹」的緣故。此冊中，輯有沈樹鏞於同治癸亥年搜得北齊《孫永安造像》，此拓片後又附另一版本《孫永安造像》，沈樹鏞於庚午年題跋云：「此亦《孫永安造像》，以椎拓較足，字畫明顯，故並存之。」⁷¹ 可見沈樹鏞重複搜求造像拓片。

沈樹鏞輯《造像拓本集》，反映出沈樹鏞積極收藏北朝造像石刻，對碑學書家趙之謙日後北魏書發展有極大的影響。在同治四年，趙之謙也以北魏書書史游《急就篇》贈與沈樹鏞。不僅是造像拓本，沈樹鏞也時常將所藏其他北朝石刻借與趙之謙賞鑒。趙之謙致沈樹鏞信中云：「《張猛龍碑》攜來，《大基山》亦爲力借，蒙其許可矣。」⁷² 不僅如此，沈樹鏞還將所搜求鄭道昭的碑額拓本贈與趙之謙。⁷³ 顯現出沈樹鏞的北朝石刻收藏，對碑學書家趙之謙發展魏碑書風有極大的助益。

從《章安雜說》，可知趙之謙關注《張猛龍碑》。趙之謙並向友人劉銓福借觀《張猛龍碑》。同治癸亥年間趙之謙從借觀劉銓福藏《張猛龍碑》達三月之久，⁷⁴ 趙之謙在劉銓福藏《張猛龍碑》題跋云：「此《張猛龍碑》最善拓本，較孫退谷家藏本字多少同，而神采過之。近時拓闕字既多，且漫漶矣。中有蠹蝕處，失數十字，可惜。」⁷⁵ 趙之謙認爲劉銓福所藏此《張猛龍碑》爲最善本，此本神采比孫承澤家藏的拓本好，顯現出趙之謙不止看過一本《張猛龍碑》，在與沈樹鏞的信中也索求借觀沈樹鏞的藏本。從《章安雜說》開始書寫的時間直到同治年間，可見趙之謙持續關注《張猛龍碑》不同的拓本。

三、結語

趙之謙雙鈎《二金蝶堂雙鈎漢刻十種》，需要大量的拓片資料相互比觀。沈樹鏞與趙之謙金石友人形成的鑒藏群體，提供所藏拓片，對趙之謙雙鈎與考釋石刻上斑剝的文字，起了重要的作用。通過俞樾、趙之謙與沈樹鏞三人賞鑒《群臣上壽刻石》，可以了解到當時金石鑒藏家對此石刻的學術探討。筆者考察沈樹鏞所藏《劉熊碑》概況，並探討趙之謙雙鈎《劉熊碑》，其在石刻文字磨泐處，故作剝蝕之筆，可能出自於書家自家的想像力。沈樹鏞及其鑒藏群體搜求北朝石刻，不僅讓趙之謙借觀，也讓其臨摹，影響其日後北魏書風的發展。

⁶⁸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第九冊（中華書局，2010），頁4446。

⁶⁹ 《魏齊造像二十品》（有正書局）。

⁷⁰ 《六朝造像精華第一集》（有正書局珂羅版）。

⁷¹ 《六朝造像精華第一集》（有正書局珂羅版）。

⁷² 趙之謙著、戴家妙整理，《趙之謙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頁296。

⁷³ 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編，《趙之謙之書畫和北魏之書—悲盒沒後130年》（台東區藝術文化財團，2014），頁16。

⁷⁴ 楊斌，〈趙之謙與劉銓福金石交遊考〉，《書法》，第1期（2020）：頁60。

⁷⁵ 鄒濤編，《趙之謙年譜》（榮寶齋出版社，2003），頁115。

⁵⁸ 仲威著，《善本碑帖過眼錄（續編）》（文物出版社，2017），頁164。

⁵⁹ 同上註。

⁶⁰ 桑椹著，〈沈樹鏞致魏錫曾信札七通箋注〉，《書法叢刊》文物出版社，第3期（2010）：頁78。

⁶¹ 沈樹鏞著、汪政點校，《鄭齋金石題跋記》（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頁22。

⁶² 桑椹著，〈沈樹鏞致魏錫曾信札七通箋注〉，《書法叢刊》，第3期（2010）：頁74。

⁶³ 趙之謙著、戴家妙整理，《趙之謙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頁134。

⁶⁴ 同上註，頁298。

⁶⁵ 康有爲著、況正兵點校，《廣藝舟雙楫》（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8），頁27。

⁶⁶ 趙之謙著、戴家妙整理，《趙之謙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頁1167。

⁶⁷ 桑椹，〈沈樹鏞致魏錫曾信札七通箋注〉，《書法叢刊》，第3期（2010）：頁77。

參考書目

一、古籍善本

《魏稼孫日記殘稿》，上海圖書館館藏稿本。

二、專書

《六朝造像精華第一集》，有正書局珂羅版。

《漢酸棗令劉熊碑不分卷》，1936，上海中華書局影印本。

《魏齊造像二十品》，有正書局。

上海圖書館編，2011，《俞曲園手札·曲園所留信札》下，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日本：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編，2014，《趙之謙之書畫和北魏之書—悲盦沒後130年》，台東區藝術文化財團。

包世臣著、況正兵、張鳳鳴點校，2017，《藝舟雙楫》，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仲威著，2017，《善本碑帖過眼錄（續編）》，文物出版社。

沈樹鏞著、汪政點校，2012，《鄭齋金石題跋記》，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阮元著、鄧經元點校，1993，《擘經室集》，中華書局。

周敏珏，2019，《端方及其交遊圈的金石鑒藏研究》，浙江大學博士論文。

俞樾撰、徐明、文青校點，2001，《春在堂隨筆》，遼寧教育出版社。

徐珂編撰，2010，《清稗類鈔》第九冊，中華書局。

浙江省博物館編、桑椹主編，2014，《六舟——一位金石僧的藝術世界》，西泠印社出版社。

秦多可，2015，《漢劉熊碑拓跋文解讀和版本淺析》，中國藝術研究院碩士論文。

秦更年撰、秦藎整理、吳格審定，2019，《嬰閣題跋》，中華書局。

康有為著、況正兵點校，2018，《廣藝舟雙楫》，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陸維釗，2021，《中國書法》，浙江古籍出版社。

童衍方，2016，《金石齋壽—金石家書畫銘刻特集》，上海三聯書店。

鄒濤編，《趙之謙年譜》，2003，榮寶齋出版社。

趙之謙著、戴家妙整理，2015，《趙之謙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齊淵編，2008，《趙之謙編年印譜》，江西美術出版社。

劉恆著，《中國書法史·清代卷》，2009，江蘇鳳凰教育出版社。

魏錫曾撰，1970，《魏錫曾全集》《續語堂題跋》，《叢書集成續編》原刻景印光緒癸未刊本，臺北：藝文印書館。

羅振玉撰述、蕭文立編校，2003，《雪堂類稿·戊·長物簿錄》，遼寧教育出版社。

三、期刊

《書苑》，1943，第7卷第1號，三省堂。

桑椹著，2010，〈沈樹鏞致魏錫曾信札七通箋注〉，《書法叢刊》，文物出版社。

馬順平，2017，〈晚清金石學者與「群臣上壽刻石」年代考訂—兼論沈樹鏞舊藏拓本的意義〉，《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第6期。

程渤，2014，〈清代雙鉤摹寫法研究〉，《美術學報》第5期。

楊斌，2020，〈趙之謙與劉銓福金石交遊考〉，《書法》。

盧慧紋，2010，〈錢泳《攀雲閣帖》初探〉，載於孫曉雲、薛龍春主編，《請循其本：古代書法創

作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頁315-320。

盧慧紋，2011，〈碑與帖的交會—錢泳《攀雲閣帖》在清代書史中的意義〉，《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31：208。

薛龍春，2021，〈當雙鉤本成為範本—乾嘉以後古碑的雙鉤、刊印與取法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51期。

叢濤，2022，〈“別有狂言”與“但開風氣”：趙之謙的學術身份與金石審美趣味〉，《文藝研究》第3期。

顧廷龍著，1935，〈吳憲齋先生年譜〉，《燕京學報專號之十》，哈佛燕京學社叢濤。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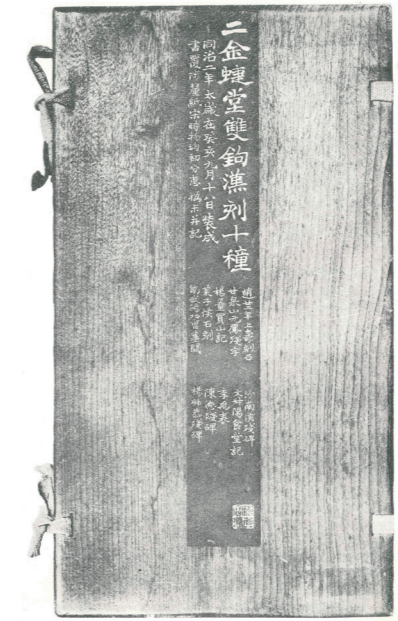


圖1：趙之謙，《二金蝶堂雙鉤漢刻十種》，雙鉤本，清代，全氏葆華閣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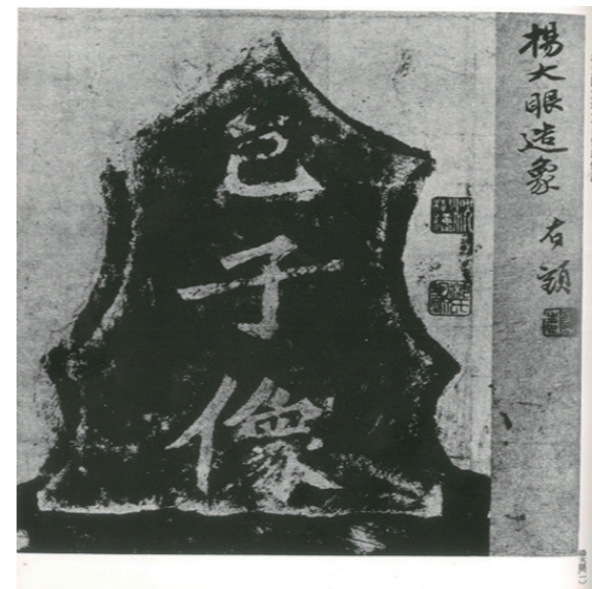


圖2：《楊大眼造像記》局部，拓本，北魏，私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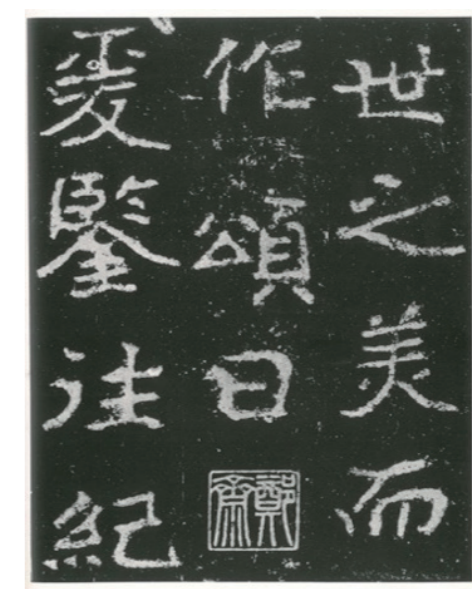


圖3：鄭道昭，《鄭文公碑》局部，拓本，北魏，私人藏。